

构建“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

——兼与石仲泉、罗振建等学者商榷

王学荣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中国梦”是否可以称作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目前理论—学术界看法不一,并且意见分歧非常大。代表性学者石仲泉先生是明确反对“中国梦是理论体系”这样的提法的,而罗振建先生和程美东先生则主张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但很遗憾,罗、程二先生都将“中国梦”的“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简单地归结为“一体三位”,这实际上是很不周全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所涉企的范围非常之广阔,其包摄的内容亦极其之宏富,远远不止所谓的“一体三位”。况且,中国梦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化,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充实。藉此之故,将中国梦“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归结为“一体三位”,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其他诸多丰富的内容都被遮蔽掉了,其片面性是很明显的。

[关键词]“中国梦”; 思想—理论体系; 建构; “一体三位”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5-0037-06

一

“现代性是中国梦的时代特征”,中国梦是“目的王国的建构”,但并不是“任何时代条件下目的王国的建构”,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理想和目的王国的现代重建”,亦可以说,中国梦是“文化理想或目的王国的话语表达方式”^[1]。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梦”的探讨非常之多。迄今为止,“中国梦”是一种发展战略,这在理论—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然而,“中国梦”是否可以称作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呢?对此,目前理论—学术界意见分歧比较大。总体而言,赞成者居多,然而反对者亦有之。譬如,国内知名学者石仲泉先生是明确反对“中国梦是理论体系”这样的提法的,而罗振建、程美东等学者则主张“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对于罗、程二先生的这一主张笔者当然是认同的。然而,石先生为何明确反对“中国梦是理论体系”这一提法,学术界的这一分

歧也引起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中国梦”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又该如何来建构?罗、程二先生都将“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简单地归结为“一体三位”,这在笔者看来是不周全的。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笔者持有不同看法。所谓“真理不辨不明”,并且“真理愈辨愈明”,这一道理逐渐为愈来愈多的学者认可和接受。有学者指认,“对于任何一个学术领域而言,不同学者之间不同观点和见解的讨论、交锋和争论,从来都是学术发展内在的根本动力。”“这是被学术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公理’。”^[2]记得梁任公(梁启超)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曾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精辟而富有创见地谈道,“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纷争而益盛。”^[3]正是本着促进学术交流、繁荣我国学术之愿望,笔者遂不揣冒昧和浅陋作此文与石仲泉、罗振建、程美东三位教授商榷,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所助益。

[收稿日期] 2019-03-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MLC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学荣(1984—),男,汉族,湖南炎陵县人,法学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现代西方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

二

众所周知,“中国梦”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明确阐发的,习总书记这样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4]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梦”的范畴,并且精当地概括了“中国梦”的核心意旨。习总书记“中国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很快便成为一个“热词”,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共鸣,甚至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干部群众畅想中国梦,社会舆论聚焦中国梦,港澳台同胞心系中国梦,海外华人述说中国梦,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梦”。^[5]从此,我国理论一学术界也对“中国梦”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和探讨。有学者甚至指认,“从已发表的文字来看,人们已从方方面面‘对中国梦’进行了全方位解析。这些解析既有政治和经济指标方面的,又有国家、社会和个人位置方面的,还有民族与国际关系方面的,更有历史起源和现实经验关联方面的,可谓极其全面与详尽,其程度至少不亚于学界既有的各种关于梦的解析的文字。”^[1]

然而从当前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目前学界对“中国梦”的研究尽管汗牛充栋,但有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很深入探讨。例如,关于“中国梦”究竟是否可以称得上“思想一理论体系”,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赞成,亦有学者明确反对。例如,著名学者石仲泉先生就明确反对“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这样的提法,笔者则认为,“中国梦”称作“思想一理论体系”是可以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思想一理论体系”。笔者想就这一问题商榷、就教于石仲泉教授。

罗振健、程美东两位学者都赞成“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并尝试对其思想一理论体系进行建构。对此,笔者并无异议。然而,罗、程二先生却均将“中国梦”思想一理论体系归结为所谓的“一体三位”,笔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罗、程二教授的这一概括尽管在一定意义上给人以启发,但未必很全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渴望与罗振健、程美东二教授切磋讨论,亦想在罗、程二先生的基础上做点补充。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笔者曾经在《“中国梦”再

探:从发展战略到思想体系》(以下简称《再探》)一文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因此亦请读者诸君参阅此文。^[6]然鉴于该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有进一步加以澄清的必要。由于笔者深信“真理越辩越明”这一道理,因此,在学者之间展开诚恳、纯真的学术争鸣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可以的、甚至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笔者坚信:诚恳、纯真的学术讨论往往会大大助益于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化。我一贯主张,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和不懈追求应该是一个学者必备的品质。正如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此言是矣!亚氏这句名言已然成了千古之绝唱,虽时代相去甚远,却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学人的“座右铭”。正是本着共同探讨理论问题、繁荣我国学术之夙愿,同时也为了使笔者的观点主张更加凸显、更加明朗,于是笔者在《再探》文的基础上又作拙文斗胆与石、罗、程诸先生商榷之。石仲泉先生、罗振健先生、程美东先生毫无疑问均为国内理论界的知名学者,而且都是前辈,尤其是石仲泉先生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笔者作为一位年轻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许还不是很成熟,本文若有不当之处,恳望石仲泉、罗振健、程美东诸教授批评指正,同时亦热忱欢迎理论一学术界同仁对该问题有兴趣者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中来。推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三

“中国梦”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这在学界已经是“共识”。然而笔者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中国梦”是一个“思想一理论体系”吗?到底如何判定它是否可以称得上“思想一理论体系”?如果是“思想一理论体系”的话,它的体系又包含哪些重要内容呢?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理论一学术界是有很大争议的。

首先,在“中国梦”是不是“思想一理论体系”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很不一致,意见分歧甚大,甚至不同的学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罗振建先生和程美东先生都明确主张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科学思想体系),不过,程、罗二先生关于中国梦体系在称谓和表述上略有区别,罗振建先生将中国梦的体系命名为“科学思想体系”,程美东先生则将中国梦的体系称为“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中国梦”既可以说是“思想体系”,亦可以说是“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干脆将其称为“思想一理论体系”,这样或许更为全面。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石仲泉先生则是明确反对“中国梦是理论体

系”这样的提法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罗振建先生和程美东先生的观点,主要商榷和就教于石仲泉先生。

石先生认为,中国梦仅仅是一种“发展战略”,但根本谈不上是“理论体系”。石先生指认:“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中国梦’是发展战略,但不是理论形态。现在各个部门、各方面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中国梦’,这个积极性很好。但是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文风。最近,有的文章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试图把‘中国梦’建构成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自由研讨,但这又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因此应慎之又慎。”^[7]

石先生显然认为,“中国梦是不是理论体系”这一问题,“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笔者试问:如果我们仅仅就“学术”的角度而言,中国梦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么?笔者认为,要真正回答“中国梦”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体系”,这无疑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伊曼努尔·康德在“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一句至理名言,想必大家非常熟悉,康德说:“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会被给予;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不能被思考。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8]其实,后两句或许也可以更简洁地翻译成“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可见,科学研究也好,具体问题的解决也罢,适当的“概念”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否则将是“盲”的。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所谈道的那样:“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不可少的工具。”^[9]国内亦有学者指认,“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没有科学合理的概念界定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学说。”^[10]在笔者看来,要判断“中国梦”究竟不能不称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罗振建先生称之为“科学思想体系”,程美东先生称之为“理论体系”,石仲泉先生则否认中国梦是一个“理论体系”),也不得不借助于“体系”的概念——这一“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不可少的工具”或者说“理论研究的基础”。为了让笔者的探讨更加有说服力,我们不妨以《现代汉语词

典》关于“体系”的概念作为探讨的依据,因为《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体系”的概念无疑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且让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1241页,《现代汉语词典》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一权威解释,“中国梦”显然是与这一概念的内涵相符合的,因为“中国梦”确实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关于这一点,由于下文将会详细谈到,故此处不赘。而只要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构成的有机整体,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思想—理论体系”。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主张“中国梦”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①、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因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过许许多多的新战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化,这些思想和论断还正在进一步地发展。中共十九大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战略、新思想、新论断明确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12]。由是观之,“中国梦”体系并不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列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列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式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梦”确实是与《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体系”的定义相吻合的,从学理上讲,“中国梦”确实可以构成一个“思想—理论体系”。

石仲泉先生之所以反对“中国梦是理论体系”这样的提法,因为石先生认为,“中国梦是理论体系”也就意味着“中国梦”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列的。所以这“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应慎之又慎”。我们不妨试问,难道“思想—理论体系”

^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代表”并不是一码事,但理论—学术界常常有学者将二者相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约言之,“三个代表”所指认的是三句具体的论断,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主张将与“三个代表”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就一定要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并列吗？或者换言之，难道只有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并列的才称得上是“思想—理论体系”么？显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思想—理论体系”未必一定要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并列，也并非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并列的才是“思想—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存在着灿若星汉的“思想—理论体系”，莫非都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列的么？当然不是。其实，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只要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构成的有机整体，都可以称为“思想—理论体系”。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仅仅就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说“中国梦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这至少在学理层面上是完全能够自洽的。

四

如上文所述，既然中国梦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它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重要内容呢？或者说，如何来构建“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呢？这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罗振建先生和程美东先生都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探索，二先生都将“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归结为“一体三位”。不过，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我认为罗、程二教授的这一概括尽管在一定意义上给人以启发，但未见得是周全的。因此，笔者想在罗、程二先生的基础上再做补充。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商榷和就教于罗振建先生、程美东两位先生。

罗振建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梦的思想体系》一文中这样谈到：“中国梦是一个‘一体三位’的科学思想体系。‘一体’是指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它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国梦的问题。……‘三位’是指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它集中回答了怎样实现中国梦的问题。”^[13]程美东先生在《如何从理论体系上把握“中国梦”》中亦写道：“理解‘中国梦’理论体系，最简练的表述就是‘一体三位’。‘一体’就是中国梦的内涵：中华民族复兴；‘三位’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14]很明显，这二位先生尽管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别，但二者的核心观点却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是罗先生还是程先生，都将“中国梦”的体系概括为“一体三位”，并且二者对“一体”和“三位”的理解也基本相同。笔者认为这种概括至少是不够周全的。因

为事实上，“中国梦”涉企的范围非常之广，其包摄的内容亦非常丰富，远远不止这些学者所谓的“一体三位”。由是观之，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如罗、程二先生）将“中国梦”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体三位”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即是：“中国梦”体系其他众多的丰富内容遗憾地被遮蔽掉了，这对“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研究显然是不利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在《通融与耦合：中国梦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关系探微》一文中讨论过，因此亦请读者诸君参阅拙文。^[15]

“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意蕴深远。”^[16]在笔者看来，“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除了上述学者所概括的“一体三位”之外，还应该包摄诸多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这些重要内容在“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是不能够“缺位”的。例如，发展阶段问题（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两个百年”，甚至“三个百年”的目标）：一是“建党一百年”，即到2020年前后（因为2021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还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方面对“全面小康”作出了生动而细致的描绘^[17]。二是在“建党一百年”目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百年”（“建国一百年”）的目标，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具体而言，是2050年前后，因为2049年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第三个百年”的目标，即“改革开放一百年”（也就是2078年前后，因为2078年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100周年）的战略布署。不仅如此，“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还应该包括一些更为具体的目标任务，例如，“中国梦”作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还应当包括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诗意中国“六大愿景”等丰富内容。再者，“中国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而言，还应当涵盖和平的国际环境。此外，“中国梦”的理论体系还应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当前一般称作“新发展理念”）^[18]，等等。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梦”的思想—理论体系所包摄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并非所谓的“一体三位”能够概括得了的。事实上，在坚持中国梦的“主题”和“核心内涵”的前提下也可以适当拓展其内容。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适当拓

展,但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要紧紧扭住这个主题激活传递正能量。”^[19]而我们这里所拓展的“两个百年”的发展阶段与战略布署(“双百布署”)、“六大愿景”、“和平的国际环境”、“新发展理念”等内容都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核心内涵”而展开的,也都是“紧紧扭住这个主题激活传递正能量”的。因为不管是“‘两个百年’的发展阶段与战略布署(‘双百布署’)”抑或“六大愿景”也好,“和平的国际环境”抑或“新发展理念”也罢,其根本意蕴都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重大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20]藉此之故,“中国梦”思想一理论体系的建构注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进而言之,“中国梦”思想一理论体系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梦”的思想一理论体系一定会包括更加丰富的内容。因此,“中国梦”的思想一理论体系也需要不断充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观点仅代表笔者的一家之言或者说一孔之见,或许尚不成熟,不当之处恳望石仲泉、罗振健、程美东诸教授批评指正,亦热忱欢迎理论一学术界对此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同仁展开争鸣与商榷,以进一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促进该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是我们共同之期许。当然,如何将“中国梦”这个庞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恰当地构建起来,这恐怕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学术任务,笔者才疏学浅,恐不足以胜其任。拙文权且算是抛砖引玉,其意旨乃是激发理论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热忱呼唤学界之硕学鸿儒群策群力、共襄盛举,共同推进这一项“未竟的事业”,是所望焉。

【参 考 文 献】

- [1] 王南湜. 中国梦:重建中华民族的目的王国[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 (1).
- [2] 张斌贤. 教育学界为什么少有争论? [J]. 教育科学研究, 2017, (11).
- [3]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31.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36.
- [5] 本书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96.
- [6] 王学荣. “中国梦”再探: 从发展战略到思想体系[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5, (4).
- [7] 程冠军(本刊特约记者). 以科学的态度解读“中国梦”——专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J]. 领导文萃, 2013, (8): 下.
- [8] 转引自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10.
- [9]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邓正来, 姬敬武, 译. 梦觉, 校.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465.
- [10] 高桐杰. 生态民主主义思想述评[J]. 理论导刊, 2013, (7).
- [11]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41.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0.
- [13] 罗振建. 深入研究中国梦的思想体系[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5).
- [14] 程美东. 如何从理论体系上把握“中国梦”[N]. 北京日报, 2013-06-24.
- [15] 王学荣. 通融与耦合: 中国梦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关系探微[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
-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53.
- [17]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2-11-18 (02).
- [1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J]. 共产党员, 2015, (11): 上.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0.
- [20]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41.

(责任编辑: 谢光前)

(下转第58页)